

抗日战争史 论文集

中国现代史学会东北分会编

A large, stylized graphic design in red and white, resembling a stylized flame or a series of overlapping, curved shape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cover.

吉林文史出版社

抗日战争史 论文集

主 编：陈瑞云 周玉和
副主编：程舒伟 杜 君

Kangrizhazhengshi Lunwenji

抗日战争史论文集

陈瑞云 周玉和 主编

责任编辑：毛振家

封面设计：葛万明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80 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东北师范大学校办印刷厂印刷 印数：1 000 定价：5.50 元

ISBN 7-80528-348-6/K·158

编 者 的 话

1990年8月6日至10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了东北地区中国现代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81篇。这些论文以中国抗日战争史为中心，探讨了1931—1945这段历史的诸多方面，尤其以东北地方史的内容居多。

在编辑这本论文集时，考虑到三条原则：一、保证质量，使读者有所得；二、体现地方特点；三、尽可能使提交会议的论文都有着落。为此，采取以下措施：一、少数论文，根据内容需要，不对字数做严格限制；二、多数论文限在5000字以内；三、部分论文摘其要点。

为了完成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在东北地区中国现代史学会领导下，成立编委会，由陈瑞云、周玉和、程舒伟、杜军、宋世章、李志铭6人组成，进行稿件的初审和修改工作，最后由陈瑞云同志审定。他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稿件审查、修改和编排，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李茂杰、蒋志平同志也做了很多编务工作。

吉林文史出版社毛振家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伪皇宫陈列馆的领导也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辑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指正。

1990年9月30日

目 录

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	王维礼 (1)
论中缅国际公路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楚天佑 (17)
抗战时期南京政府监察制度述略	孙学敏 (31)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战争	王续添 (47)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外交政策的比较	唐继革 李志铭 (58)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亡组织	潘启贵 金书勤 (70)
下层统一战线初探	王宝梁 (76)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工作经验	傅 飞 (80)
敌后抗日根据地公安机关主要活动及其作用	刘亚东 (85)
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连胜 (90)
试述救国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李 辉 (95)
张闻天在抗战时期对共产党党建理论的贡献	栾雪飞 (100)
宋庆龄抗战思想初探	崔云飞 田越英 (104)
张学良抗日军事思想浅论	高景生 (110)
空中英雄高志航	张世杰 (117)
全面抗战中的胡适简论	张德旺 (122)
略论陈独秀的抗战思想	贾立巨 (130)
坚决抗日的宣传者	
——谈陈独秀的抗日宣传活动	牛辅恒 (139)
试论九一八至七七的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	
初级阶段	刘成富 (145)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刘贵福 (149)
试论抗日战争十四年	王家德 韩志峰 (155)

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蒋颂贤 (162)
试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统一战线	邢丽雅 (169)
“北方会议”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的危害	徐学新 (174)
杨靖宇的战略战术思想	宋世章 (183)
谈周保中的抗联日记	潘景隆 赵庆文 (189)
新邱煤矿工人暴动	王云鹏 (197)
江桥抗战及其作用	陈炎 孔令波 (202)
试论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地位 与作用	宿丰林 (212)
略述东北抗日救亡斗争的特点及作用	马淑梅 (220)
略论苏联出兵东北的动因及其对国共两党东北争 端的态度	简明 (225)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争夺战	赵英兰 (233)
华北事变发生论	程舒伟 高瞻 (241)
从南京失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的 日本侵华政策	吕玉莲 (247)
关于万宝山事件研究中 几个问题的思考	王霖 马春芳 (257)
从“日本军司令官布告”看九一八事变	沈燕 (262)
关东军统治部的设立及活动	李茂杰 (265)
溥仪在天津期间与日本军人、政客的关系 ——兼论溥仪是怎样离开天津的	赵聆实 (272)
溥仪建军始末	蒋志平 (281)
溥仪第三次登基述略	王庆祥 (286)
伪满洲国政府官吏体制的双重系统	于庆祥 (294)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驻东北殖民 统治机构的改革	王丽杰 (307)
伪满经济警察对东北的统治	张玉芝 (312)
日伪统治时期的长春的“城市建设”	霍燎原 (317)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

殖民地教育	王子夜 (327)
试谈日本对东北的移民侵略	孟东风 (330)
日本夺取中东铁路的前前后后	王继周 (341)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营口港的	
劫掠与摧残	孙福海 王金令 (346)
藏式毅的一生	王文锋 (354)
部分论文摘要	(360)
中国现代学会东北地区分会成立大会暨抗日战争	
胜利 45 周年学术讨论会简况	(380)

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的若干问题

王维礼

如何客观地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向来是海峡两岸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这里，有原则性的分歧，也有是与非的论辩，有立场上的差异，也有认识上的不同。但是，历史总是客观存在的，史学家的责任，首先是应当尊重历史，感情不能代替科学，偏见也只能引出谬误。实事求是地依据历史的真实，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应当是共同遵循的原则。本着这种精神，对于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国民党人和台湾史学界把它说成是“战略持久”方针的体现，是“知己知彼”的“卓越远见”^①。称赞这种政策“争取了四年充实国力的时间”^②，或者说争取到“黄金十年”的“宝贵的战备时间”^③。大陆方面，近年来也有人著

① 蒋纬国：《中日战争之战略评析》，《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

② 吴湘相：《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2页。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

③ 蒋纬国：《中日战争之战略评析》，《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

文认为把这一方针说成是妥协、投降的，是不科学的^①。

这里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评价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内容、性质和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期间，经历了蒋介石下台又上台；蒋汪合作又破裂；抗日潮流的起伏和国共激战的曲折；中日间的武力入侵、交涉与妥协。在这极其复杂的形势下，蒋介石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也经历了不同变化，但就其内容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和外剿共”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基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认为面临对日本和共产党的“两个战争”，国民党受到“两面夹击”^②。那么，谁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敌人？蒋介石说，“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严令“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③。“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④。这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基本依据。蒋介石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是“抗日来攘外”，而“剿共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⑤。亲日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黄郛曾说：“和外剿共，始为救时救党的上策”^⑥。真可谓道出了“安内攘外”政策的真谛。

第二，“安内攘外”政策中的对日态度，就是“忍辱负重”，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2期，第30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63页、66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续编》（三），第36页。

④ 于右任致张学良电（1931年9月13日），《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84页。

⑤ 蒋介石：《对剿共军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年4月7日。

⑥ 《生活周刊》第8卷，第21期。

“逆来顺受”^①。“忍辱”是为了“顺受”，“顺受”就得容忍和妥协。台湾史学界称颂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是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不计较个人毁誉，更不退一时意气”^②的胆识，更不象那些坚决要求抗日的人民那样“只是学南宋人高唱‘满江红’，虚骄激昂，不务实际”^③。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政策的重要原因，是他的民族失败主义，这是由他们阶级特性所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无力打败日本，“中国一切不如人”。蒋介石一再表示“不求急功于一时”，不“博一时之虚荣”。他在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精神训话》中说：“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就是三天之内，它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地方都占领起来”^④。这种民族失败主义的“三日亡国论”，说明他当时既不想抵抗，也不敢抵抗，以“和外”求苟安，集中力量剿共，是他政策的核心。

第三，依赖外援，求助“公理”，是实行“安内攘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蒋介石不想动员国力人力，进行抵抗，求助国际，依靠美英，以“公理战胜强权”，即利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矛盾，阻止日本独占中国。这是历代统治者以夷制夷政策的翻版，“在夹攻中求生存”的一种侥幸心理的反映。

第四，以反共求得日本的谅解，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是“安内攘外”政策的重要目的。蒋介石曾告诫日本不要相逼太甚，“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压迫而崩溃”，共产党势力就要“抬头”，结果就会在相争中“同归于尽”^⑤。蒋介石从共同对付“中国国民党

① 《暴日战据东北痛史》，第36页。

②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

③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2页。

④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22页。

⑤ 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

之后”的势力，即共产党势力出发，企图与日本求得妥协。这种妥协的限度，就是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默认日本占领东北。所以，表面上要求收复东北，实际上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设关，变相承认。这就是“安内攘外”政策的妥协限度，说蒋介石就是要投降日本，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也是蒋介石的妥协与汪精卫的投降的根本区别。

“安内攘外”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民党采取了民族斗争服从于阶级斗争的政策。它们从维护统治出发，以革命人民为主要敌人，正是它们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性。然而，国民党又不敢放弃“攘外”的口号，它只能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四不政策”、“长期抵抗”、“上诉国联”等为托词，掩饰其对日妥协的真相。所以，“安内攘外”政策也是“作为‘政府权力’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把‘抗日’这一国民性课题掌握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而建立的政治路线”^①。

“安内攘外”政策的主要恶果，是助长了日本侵略的深入；打击和破坏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力量；消耗了国力，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自称一贯唱“低调”的丁文江，也认为“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②。正因为对日妥协，才引起国人不满意。愈是为了妥协而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更加激起人民更大地抗日浪潮，包括国民党内抗日派的分裂。不攘外就不可能安内，不攘外更不能统一。因而，倒行逆施，只能适得其反。蒋介石以强力镇压，却压出来全国规模的抗日高潮——一二九运动；以“剿共”相逼，却逼出来连蒋本人也被扣的西安事变。所以，有人说：“要想统一，唯有抗日，从对外着手，也才能求得统一”^③包括胡汉民也认识到：“目前国内最大的不安，只有东北三省在日本霸占之下，与热河平

① (日) 池田诚：《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第75页。

② 《独立评论》，第35号。

③ 《张学良资料选辑》，《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第119页。

津在日寇侵略之中”，所以，只有“从攘外中求安内”^①。

王造时曾经以“安内必先攘外”为题，深刻分析了这个政策的反动作用及其结果。“政府根据这个政策，所以不派大军北上收复失地，而调动三十万军队，去围剿共产党”；“政府要根据这个政策，所以对日本得寸进尺的侵略，不惜忍辱负重”；“政府又根据这个政策，所以对于国联，明知其不可依赖而倚赖”；“政府再根据这个政策，对于国内不满意，或反政府的个人、团体，监视及压制得非常厉害”。其结果，国民党无力剿灭共产党，也无法剪除地方实力派，误国害民，人民不满，只能是“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②。

台湾史学界特别宣扬“安内攘外”政策赢得了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间，这是一种遁词。镇压抗日运动是为了准备抗日？对日军入侵不抵抗，大举围剿共产党，而且要“专心剿共”，“侈言抗日者杀无赦”，难道也是为了抗日？蒋所宣传的“剿共”是“抗日的前提”，不过是“剿共和外”的代名词。1935年、1936年间，蒋介石确实作了一些抗日的准备工作，那是“安内攘外”政策碰壁，不得不改变对日妥协政策。所谓因为实行“安内攘外”政策，才争得了“黄金十年”的战备时间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愚弄群众的借口而已。

总之，以反共、妥协为特征的“安内攘外”政策，在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和抗日运动洪流的冲击下，宣告破产。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但是，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改变，反共、妥协这种阶级性的特征，却一脉相承地继续下来，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因而，抗战时期出现

① 《什么是我们的生路》（1933年3月），《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卷第3期，第20页。

② 《荒谬集》，第110—112页。

的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就是必然的了。

二、关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

传统看法认为，蒋介石所以放弃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转向对日抵抗，是被迫的。主要是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对蒋介石的冲击，不抗战，无法维持其统治；美、英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使蒋日矛盾的激化。近年来，大陆史学界有人提出：上述条件只是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外部条件”。蒋介石转变的“决定因素”和“基本依据”是他的主观条件，即“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感情”^①。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全国团结抗日局面实现的重要条件，假如没有国民党政党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转变确实被逼出来的，并不是“蒋介石一贯的民族主义感情发展的自然产物”^②。用蒋介石自己的某些豪言壮语和表面文章，并不能说明他的“民族主义感情”，只能象黄郭的夫人沈亦云所说的“人人知不能战，而不敢言不战”^③的当权派的矛盾心理的反映。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对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如何认识和评价。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迫民族中，包括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是有利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是有进步性的。对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的抗日活动，我们从来给予肯定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

① 《社会科学家》（桂林），1988年第6期。

② 《社会科学家》（桂林），1988年第6期。

③ [台湾]《传记文学》，第6卷第1期。

战”^①。但是，在肯定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对它作具体分析。

第一，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中的妥协性。如果简单地把蒋介石说成是就要投降日本，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蒋介石的统治受到日本侵略而不可保时，他确实表现出某种反抗性。蒋介石从来也都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的。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当权派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具有妥协性。因为，它们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反抗程度，取决于对它统治权的影响程度。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企图以东北和华北主权为代价，苟安一隅，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而不可得，才最后进行抵抗，就是明显的例证。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不敢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以取得帝国主义对它政权的支持为限度的。既或在抵抗中，也是幻想在某种有利于统治的条件下求得某种妥协，这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多次谋求对日妥协的根本原因。

第二，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中的依赖性。蒋介石认为中国是世界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总想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以夷制夷，依靠外力保住统治。30年代初，列强对日本侵略的姑息政策，正是促使蒋介石对日政策长期动摇妥协的重要客观原因。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还总是幻想等待英美参战，求得速胜，也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第三，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中的阶级性。蒋介石为了维持统治的巩固，在对内对外关系的处理中，总是从它的阶级利益出发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是他的“心腹之患”时，就必然把“先安内而后攘外”作为“正本清源”^②的国策。即使在抗战中蒋介石也是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原因也在于此。他说：“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7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415页。

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不达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是至死不变的”^①。

第四，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中的片面性。蒋介石在抗战中只是采取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们不肯发动人民群众抗日，不愿改善民生以调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更不想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毛泽东指明：“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②。

综合以上分析，笼统地把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称之为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显然是不符合实际，也是不科学的。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和他的所有政策一样，也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日本史学家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代表构成抗日民族主义上层部分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③，是有道理的。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反人民性，并不会因为实行民族主义政策而有所改变，其变化的只是策略和手段。

三、关于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

台湾史学界论述抗战中国共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中共在抗战前夕已处于“穷途末路”，为避免被“国军”消灭，“隐藏了共产主义原则，弹性地利用了民族主义”，向“国军”“输诚”、“乞降”^④。国民党政府为“团结御侮”才“收编”了共军^⑤。这当然是阶级的偏见和对历史的歪曲。但国民党所以采取联共抗日政策，确实有它自身的考虑和目的，并不象大陆史学界某些文章所说的

① 《中共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7—358页。

③ (日)《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第75页。

④ 《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1985年12月。

⑤ 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46页。台湾世界书局，1977年。

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都“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共产党作出“妥协”^①。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3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础是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对国民党来说，这种转变不只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提议”^②，而是适应形势的变化，针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提出的一种政策和策略上的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对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只是从“武力剿共”改为“和平统一”，目的还是为了“根绝赤祸”。在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白地写着：“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擲其血汗以从事剿共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何种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永奠民族复兴之基，此当明白告天下也者”^③。为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会，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四项原则，提出四点”^④，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让中共“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⑤，就是让共产党“投降”。这就是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或称之为“和平统一”策略。为此：

第一，国民党在联共抗日中反共立场从未改变。对它们来说，联共既是在对日抵抗中的一种需要，又是在政治联合中“溶化”共产党的一种手段。

第二，国民党策略上的改变，是以承认共产党的力量为前提

① 《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50页。

② 胡华：《中国革命史》上册，第439页。

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0页。

④ 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45页。

⑤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3页。

的。但，它又是以老来自居，以我为主，摆出一副接受“输诚”，“收编共军”的架式。所以，这种联合，从来都是不平等的。

第三，国民党在联合中总是希望共产党被削弱甚至被消灭。它的手法，就是限共、溶共、反共。这三者是密切联系，互为所用。但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要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但限制到能够利用的程度；在利用中溶化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超出限制，不受溶化，当即反共。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一规律。

周恩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希矛盾处，也就是他政治特点。”^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抗战八年中，尽管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制造磨擦，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但并没有同共产党希后破裂，把合作抗日坚持下来。根本原因，还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仍然处于主要的地位。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反共活动的特点是，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当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可以利用时（如抗战初期），合作的就比较好；当他感到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不利于统治时，就制造磨擦，“限制异党活动”，甚至发动军事进攻。然而，这些反共活动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蒋介石反共借口是共产党“破坏军令政令统一”，“妨碍抗日”，但它是以不破裂合作抗日为限度。对“处置”共产党的做法，一方面要“严厉”对待，一方面又不要“激成共党之不安”。制裁共产党的活动，要“避免党派斗争的痕迹”。它们的手法是，对共产党员的“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反共活动的分工是，“党部挑起磨擦，军队执行攻击，政府装做调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53页。